

吴南生:改革开放的“孙悟空”



吴南生

“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过‘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2018年4月10日16时19分,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广东省政协第五、六届主席吴南生在广州病逝,享年96岁。他的秘书张宜光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

吴南生是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奠基者之一,1979年3月,他向中央提议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优惠政策把外资吸引进来。邓小平说,就办成特区。

“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吴南生的名字总是和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联系在一起。他是广东经济特区主要拓荒者。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他曾在多个场合回忆,那是“提着脑袋办特区”。

1979年1月,广东省委分工吴南生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在家乡汕头看到了不忍直视的一幕: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道路坑坑洼洼。打电话十次有九次不灵。整个城市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

吴南生回忆,在汕头的那段时间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副江山啊!”有朋友提议,敢不敢办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自由港这类的东西?

朋友的话启发了吴南生。在省委常

委会上,吴南生在汇报工作时说,建议在沿海划出一片地方,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吴南生主动请缨:“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

很快,吴南生的想法得到了中央支持。邓小平给了三句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这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调。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仲勋对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随后,吴南生全力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立法。吴南生曾回忆说,两千多字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起草到公布,修改13次,只用了一年时间。随后,他又陆续解决了蛇口工业区的问题,组织108人的规划设计图案,绘制经济特区的蓝图……很快,深圳偷渡、外逃现象消失了。

“我们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吴南生曾回忆说,“说白了,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的、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路子。”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1984年春天,邓小平到深圳、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办起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议,开放全国14个沿海城市。

吴南生后来总结深圳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时说,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

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

晚年:

推动潮剧复兴和发展,热心公益

吴南生出生在汕头市的贫民窟,父亲在汕头小公园骑楼下修理钟表,是工会积极分子。读小学时,他就开始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鲁迅的《故乡》等许多文学作品,已经能写两三千字的文章。

据《南方日报》报道,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吴南生写了一篇名为《评萧红的〈生死场〉》的文章,发表在《星华日报》上,笔名叫“左慈”——《三国演义》中掷杯戏曹操的狂道士,“那时觉得他很厉害,代表正义的声音。”那年吴南生14岁,得了2元稿费,堪称一笔巨款。

吴南生回忆,当时父亲失业十年,心情不好,动不动就拿挑水的绳子打他,“我很硬气,就是不哭,他就愈发生气地打。现在好了,妈妈劝他,不能再打了,孩子已经长大,会在报纸发表文章了。从此以后,爸爸就没再打我了。”他陆续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成了汕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老党员的关注,并在1937年8月破格入党,并参加革命。

1945年日本投降时,吴南生回忆,整个延安都沸腾了!没有电灯,大家就点亮火把,在一个个山头、窑洞间传递喜讯,我们还把破布点燃,跳着,唱着……

吴南生见证了共和国的成长史,并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开拓者。

在改革闯将之外,吴南生还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书法家和书画鉴赏家。

他对潮剧颇有感情,参与和创作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潮剧剧目。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曾力推将《苏六娘》、《荔镜记》、《告亲夫》、《闹开封》、《王茂生进酒》、《刘明珠》等剧目拍成电影,发行

海内外,让潮剧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剧种。

96岁高龄时,他还在关心广东戏曲走出广东、走向世界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吴老在与广东潮剧院的领导和演员们交流时,特别叮嘱一定要把戏曲的字幕做好,让听不懂广东方言的观众看得懂、欣赏到广东各个地方剧种的独特艺术魅力。

作为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的终身荣誉会长,吴南生一直热心公益。2012年,在报纸上看到梅州三姐妹没钱交学费的报道后,他连晚饭都顾不上吃,打电话给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辗转找到三姐妹,把大学四年的学费统筹安排处理好。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吴南生说:“要重视这件事。出现这样的事情后,大家伸手拉一把。”

后来,吴南生还倡议,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开展“圆梦大学”的项目,资助梅州、河源、揭阳、汕头、潮州5市106名考上重点大学的困难学生。促进会还与南方日报联合设立“广东大学生重症救助基金”,筹集200多万元善款,已救助15名贫困重症大学生,其中吴南生带头捐赠60万元。

综合《深圳特区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



杨贵

杨贵:一生事业红旗渠

杨贵曾是河南林县(后改为林州市)的县委书记。从1954年到1973年,杨贵当了将近20年的县委书记。在任上,杨贵耗费十年时间,主持挖掘人工引水渠“红旗渠”,彻底解决林县地区干旱问题,杨贵因此蜚声海内外,被称为“红旗渠”总设计师。

4月10日0时48分,杨贵在北京方庄家中因病去世,终年90岁。去世前,杨贵告诉保姆王相云,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再回红旗渠看一看,不能再给因修渠身亡的民工扫墓。

发现,脸盆只有烩面碗大小,水还只有半盆。这边洗着脸,那边不停地“叮嘱”:“您洗完脸千万别把水泼了,俺还等着用洗脸水喂牲口哩!”

在这种情况下,“兴修水利”成为摆在杨贵面前的第一要务。自1957年起,杨贵先后主持建成英雄渠、淇河渠等水利工程,但仍不能解决大面积灌溉问题,林县依然延续着“十年九旱”的“传统”。

问题的根源在于水源。从地图上看,林县境内有浊漳河、淇河、浙河等多条河流,但是由于山路崎岖,这些河流多为季节性,一年中有一大段时间属于枯水期。

1960年,杨贵带着林县县长李贵、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沿着浊漳河、淇河、浙河溯流而上,翻山越岭去上游寻找水源。在山西平顺县,杨贵发现了浊漳河主河道。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在杨贵提出的口号下,一项凿壁引水的工程开始了。从1960年2月11日,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到1966年干渠建成通水,全部工程则于1969年7月全部完工。

此后的近半个世纪,1500公里长的红旗渠成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的代名词,成为一部现当代著名小说的主题,成为杨贵一辈子离不开的山河。

未能成行的扫墓

从1954年到1973年,杨贵担任林县县委书记近20年。保姆王相云说,即便后来担任副部级职务,生活中的杨贵“一直没离开林州”。

每天清晨,王相云会给杨贵准备早

饭,通常是小米焖饭,再把黄豆洗净,打出一杯豆浆,“偶尔吃馒头片,一般就吃一片”。

杨志勇说,父亲生前最爱吃的,就是林州出的小米粥,以及“把黄豆和小米掺在一起,打成糊糊吃”。这种糊糊,杨贵早上吃完嫌不够,可以当午饭、晚饭吃。

王相云刚来时,杨贵每次都要求她坐下一起吃,还给王相云夹菜。“这么大的干部,吃点好的补补”,在王相云的劝说下,杨贵给自己加了餐:每天喝一杯牛奶。“这种不在乎吃喝的生活习惯,是以前打仗时养成的”。

王相云说,杨贵很少提起战争年代的事情,只是到了阴天下雨时,常看到老人坐在椅子上,用拳头一下一下砸向自己的左臂,脸上的表情因为剧痛而扭曲。杨贵的左臂曾经负过伤,天气变化时,整宿整宿地疼。

在杨志勇眼里,父亲的生活自律而乏味。杨志勇在外经商,杨贵几乎每次见面都要告诫他,“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做事”、“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平时,杨贵既不抽烟喝酒,也不打牌下棋。2013年,杨贵的心脏出了问题,动过手术后,几乎从不出门,每天坐在家,看书架上的书,等着中央四套播的《海峡两岸》。

杨贵最得意的时候,还是提起红旗渠。王相云说,他几乎记得每一个因修渠而牺牲的民工姓名,以及牺牲地点;吃饭的时候,杨贵会突然问起,“红旗渠现在的灌溉量怎么样”。直到今年清明,杨贵还在念叨,要回去给牺牲的民工扫墓。

4月10日凌晨,杨贵在家中走完自己的一生。那场未能成行的扫墓,至此成为永远的遗憾。

据《新京报》

我家!”

北京方庄一处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小区内有一排三层的旧式公寓楼。杨贵的家,就在其中一栋公寓楼的一层。

客厅的正当中,挂着一张长4米的图画:群山环绕,一条河道冲出巨石。画面右上方,是杨贵被毛泽东接见的黑白照片。

画中的河道,正是杨贵一辈子念叨的红旗渠。

红旗渠精神

1928年,杨贵出生于河南汲县(今卫辉市)。14岁起,就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45年春,17岁的杨贵担任汲县五区区长。1954年,杨贵从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调任林县县委书记。当时的林县,经济极度落后,主要的原因是地表水匮乏。

《红旗渠志》记载,上世纪60年代初,林县550个行政村中,有307个村人畜饮水长年困难,有一百多个村要跑5公里以外取水吃。杨贵第一次下乡考察,想找个地方洗把脸,主人端上一个铁洗脸盆。杨贵

“部长的家,装修还不如我家”

红旗渠是上世纪60年代河南林县修建的一项水利工程。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工,前后历时近10年。据新华社报道,周恩来曾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杨贵,正是红旗渠工程的主持者和总设计师。“红旗渠”落成那一年,杨贵41岁。从1982年调任农业部算起,杨贵在北京生活了36年,期间住过很多地方。1992年左右,杨贵搬进方庄,从此再没有离开。

杨贵的家,满堂都是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旧家具,油漆斑驳,有的地方木板已经翘起。只有满墙精装的“大部头”书籍,提示着房主的不同寻常。

杨志勇说,在接老家人去家里的路上,乡亲们往往很兴奋,“看看部长家里啥样”。可是进了家门,打开灯,“嘴上不说,眼神里还是失望的”。有比较直爽的老乡会直接脱口而出:“部长的家,装修还不如